网络隐语的流变、生成逻辑与问题辨析

郑智斌

摘要:中文互联网隐语现象流变20余年,经历了初代“行话”兴起、亚文化群体隐语爆发、热点舆情事件流行语隐语化、社群和大众隐语不断迭代这四个阶段。网络隐语是互联网时代的“语言民俗”,是网民作为言语主体的语言与文化生存实践,该现象背后具有两种逻辑,既符合“内在正确性”这一语言生成的内部逻辑,又有其深刻的“网络地带”性这一现实逻辑。各言语社团通过语言既直面和解构外部世界,又构建其不同于主流世界的“存在之家”。网络隐语具有自身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对主流文化的挑战性。网民应节制其语言的自由权利,增强言语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意识,社会应为不同文化群体提供网络相遇机会,促进其走出群际孤立,共同致力于网络文化多样性和公共利益的一致。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隐语;生成逻辑;言语社团

中图分类号:G20;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3-0054-0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基金项目(22XW02)

一、引言:从网络流行语到隐语

网络流行语是互联网语言实践中最为突出的现象。2001年郑丹娘使用这一概念,指出其为青少年网民创造和使用的热词,这种另类的键盘语言在网民和非网民之间造成了“话语代沟”^[1]。从此,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界就网络流行语的概念、类型和特征、生成方式和传播机制、语用功能和社会影响等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认为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深刻的文化现象^[2]。它不同于正常语言,有很多“雷词”,有新的构词方式、语音变异和流行机制,因为语言不规范,存在能指混乱不清、所指隐晦不显、内容粗俗等问题^[3]。实际上,网络流行语类型和风格多样,其中很多具有隐秘性,符合语言学上“隐语”的根本特质。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网络语言整体现象,鲜见隐语的分类研究。2000年,曲彦斌从民俗语言角度注意到早期网络隐语现象^[4]。此后研究零星增多,认为网络隐语并非一种独立的语言,是网络语言的变种^[5],但同样具有传统隐语“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6]的特征。网络隐语有公开、半公开和完全地下三种状态,其创造动机多样,包括保守秘密、识别群体身份、维护集团内部利益、避讳或禁忌、炫耀和娱乐等等^[7]。比如网络犯罪中,使用隐语可使交流更为隐蔽^[8]。笔者认为,网络隐语不等于传统的秘密语或黑话,其主观上的隐蔽性强弱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大众型,其能指隐藏的内涵最终大家都明白,所以在大众网民中通用。比如日常社交隐语,从互联网早期至今都很盛行。又如网络语言中最为鲜活生动的舆情事件类流行语,在产生之初很多都故意曲笔言事,或者最后却发展成了隐语。二是社群型,其隐藏的内涵只为特定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网民明白并在其内部流行,这是网络隐语的重要构成。比如“饭圈”用语、“梗”和所谓黑话。这类隐语为了回避本群体之外的人知晓,绝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用或新造词汇、符号来表达,有些读起来像加密电报。语言用于传播沟通,网络隐语似乎成了反传播。有学者提出应从言语共同体角度,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外延^[9]。网络语言是现代互联网技术、网络文化与现实问题交织的产物,它既符合又打破语言学逻辑,又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逻辑。因此,当前研究的任务

不再是发现网络隐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或语言图景,甚至将其建构成新的语法,相反只有打断其语言、语法以及其与所标记的具体社会事实之间的纽结,思想和实践才能胜任当务之急。

二、网络隐语现象的源与流

陈原指出,语言变化和新词的出现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10]。语言和社会是两个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也相互变化的变量。网络语言既依存在线社会,又勾连线下现实,要考察其源流变化,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最大的影响因素:一是言语者的数量变化,即能够上网的人口规模的增长,所谓“人多嘴杂”“什么人说什么话”;二是言语对象的变迁,除线下现实以外,这里主要指网络社会生活总体内容随网民人口增长后的不断丰富,所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三是言语辅助工具的变化,即新媒体技术可为语言创造提供哪些条件,网络隐语最早依靠电脑键盘生成,现在则有专门制作的表情包形式。基于此,可将网络隐语的源与流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性过程。

(一)源于生存:初代网络“行话”横空出世

网络隐语在 Web1.0 时期就应运而生。1995 年 5 月 17 日,中国互联网向公众开放,时年网民仅 8 万人,至 2003 年底增至 7590 万。尽管如此,这八九年间互联网都是基于文字的“穷媒介”,这种崭新的数字化生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技术活。那些对电脑、网络技术、虚拟社区和聊天等一切都抱有极大兴趣的专业人员、民间活跃者作为新新人类入驻互联网,他们寄身于 BBS、QQ 等社区,不得不掌握足够的电脑知识、网络技能,并发明适用于虚拟交流的特殊交际用语。比如“斑竹”(版主)、“菜鸟”(网络新手或应用水平较低者)、“瘟酒屋”(Windows95)。特别是,为了获得类似于面对面的交流感,网民采用拟声拟像、缩略、隐喻等手法大量构造了夹杂汉英字词字母、标点符号的新词汇。比如“7456”(气死我了),是典型的“键盘语言”。早在 1982 年 9 月 19 日,美国计算机科学教授斯科特·法尔曼基于 ASCII 码发明了被世界公认最早的网络表情符号“:-)”,用冒号代表眼睛、短横代表鼻子、右括号代表下巴,意思是“发言者在开玩笑”,但需要将其右旋转 90 度才能看懂。后来有人将其改进为“S:-)”,用“S”代表可爱的波浪形卷发。这是一种字符图释(emotions)的造词法,我国网民称这类语言为“颜文字”。可见网络隐语一开始像是一门具有互联网原生属性的新的“行话”,不仅对当时非网民来说恍如天书,今天看来有的也不无新奇,其俏皮幽默为陌生冰冷的互联网机器世界增添了一抹暖色。

(二)异军突起:青年亚文化群体隐语肇兴

2004 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快速迈进“网络人人化、人人网络化”的 Web2.0 时代。一方面,网民人口增速持续加快,从 2004 年不到 1 亿到 2007 年突破 2 亿,35 岁以下网民数量占比年均高达 81.9%。另一方面,以论坛、贴吧、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社区大量涌现,其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模式允许普通人向网络世界输出自己的内容,青年网民特别其中崛起的亚文化群体成为最活跃的言语社团,大大改变了互联网内容和语言的生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二次元语言在“90 后”“00 后”网民中流行。二次元源于日本 ACG(动画漫画游戏)文化,具有萌、腐、虐、燃等审美特征^[11]。其语言词汇量极大,想象天马行空,构造手法复杂精密,要融入这个圈子就必须懂得其基本的隐语。比如“BL”(男性之间的恋爱)、“YOOO”(极端厌恶或不敢相信)。二是“火星文”在网络游戏、非主流群体中流行,类似于传统的“秘密语”。其受繁体字输入法的影响,由符号、冷僻字或汉字拆分后的部分等非正规文字符号组合而成,十分晦涩难懂,被戏称为是地球人看不懂的“脑残体”。比如“偶喷爰”(男朋友)、“orz”(跪在地上的人)。总体上,二次元用语和“火星文”在形义上都偏离了标准语言,其集团性、隐秘性和封闭性更强,隔离和阻断了与其他圈子和大众的群体外交流^[12]。此外,本时期还因为百度贴吧用户群体的兴起,出现一批由最早骂某足球运动员发展到表达种种社会情绪的专用语。比如“备胎”(恋爱关系中的替补者)、“么么哒”(亲吻某人)。

(三) 喧嚣五年: 舆情事件流行语的隐语化

2008年,因为各类热点新闻事件频发,这一年被认为是网络舆论引导元年^[13],直至2013年开始整顿互联网传播秩序以前,堪称网络公共领域发展最快、最热闹也最混乱的五年,这为网络语言生活变化提供了最重要的现实土壤。从网民规模看,2012年底高达5.64亿,5年间净增2.66亿,互联网普及率增至41.5%,虚拟与现实之门完全洞开,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社交隐语因此不断增多。比如2010年的“围脖”,是指2009年上线的新浪微博产品,其四五年间注册用户猛增到5亿,成为一时无两的社交媒体新宠。因此,这一时期微博平台对网络公共生活的影响也最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舆情事件类流行语的集中涌现,其中很多都是隐语。主要有三类:一是引转式,直接从事件报道中引用或转换出一个词语或句子。2009年的“欺实马”,源于警方鉴定交通事故车辆速度每小时“70码”一说,以谐音引申为欺负老实人。二是隐喻式。2010年的“姜你军”,是“将你一军”的谐音,指生姜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不合理上涨令消费者难以承受。三是成语式,通过自创所谓网络成语来体现某种情感、态度和立场。2008年的“正龙拍虎”,是对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老虎照片造假事件的讽刺。可以说,舆情事件类流行语是本时期互联网现实影响力快速高涨、加快跻身中国公共领域的大众语言涌现。其在语义生成上,主要通过浓缩、转喻、变造等方式来实现,内容或隐伏奇谲或曲折透露,令人只能捉摸意会。其中很多后来又被引申、转义而脱离原新闻事件,泛化为适用面更广的流行隐语。比如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当时也是某交通事故肇事人所说的原话,现在用来泛指“官二代”现象。

(四) 迭代发展: 青年社群、大众社交隐语的滥觞

2013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全面迈进移动时代,这一年网民人口高达6.18亿,从此网络无孔不入地渗透公、私领域,网民语言则同步着线上线下现实的事物及其变化。过去十余年,社交媒体呈现出类型化、平台化的双线发展,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公共生活、社群交流及其文化娱乐的发展。青年社群型隐语方面,处于时间上迭代、数量上大爆发之中。主要有:一是“饭圈”用语。“饭圈”一词于2014年前后出现,是指明星的狂热爱好者,以前叫追星族,网络时代改叫“粉丝”(源于英文fans)。“饭圈”内部有“事业粉”“妈粉”“女友粉”等,都各有其复杂的专用语,有的很像接头暗号。比如“白莲花”,指表面单纯没有心眼而实际上工于心计的人。二是“梗语”。“梗”是“哏”字的讹用,意为有笑点、伏笔或讽刺,一个“梗”相当于一个网络典故。比如“盘”,取自某相声节目的台词“干干巴巴麻麻赖赖一点都不圆润盘它”,引申为“弄、干”,例如盘大闸蟹、盘小孩。三是网生代用语。2018年前后兴起,是真正原生一代网民“00后”的流行语。比如“YYDS”,取自“永远的神”四字汉语拼音的开头字母。其特点类似于初代行话,像加密电报一般玄奥,令老一辈网民感觉恍如天书,将其划入网络黑话之列。四是更次元的亚文化用语。典型的有极其小众的耽美群体,其术语很多,比如“蕾丝”(女同性恋)。五是“抽象话”。2020年左右兴起,倾向于使用抽象、含义深远的词汇和句式,多含有令人捉摸的emoji、“梗”、脏话和四川方言。大众型隐语方面,主要变化有:一是吸收了很多青年社群型隐语。比如“饭圈”用语“C位”,指在合影或舞台上站中心位置的人,表示偶像很受欢迎。“打call”,指粉丝在演唱会上挥舞荧光棒来为偶像喝彩。现在这两个新词都被主流媒体采纳,表明亚文化社群隐语有出圈之势。二是更多盗猎、挪用官方、媒体、影视文学、网络综艺节目中的现有文本,赋予其新意。比如“买橘子”,源于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所说的“我买几个橘子去”,用于熟人之间开玩笑。三是表情包类隐语泛滥。虽然也是简单的图文样式,但有了制图软件的加持。比如2013年兴起的熊猫头表情包,将多个明星头像P到一只熊猫的脸上,至今仍是网民聊天用的最爱。

综上,网络隐语在发展中自有变和不变。不变的是它作为语言的本质,像皮肤一般时刻包裹着周遭现实的变化,初代行话建立的诙谐、幽默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每个时期都有一部分隐语犹如“天书”。变化的主要是2004年以后不同次言语社团的涌现导致隐语类型、具体样式的多样化,现在网络行话、舆情事件类隐语不再突出,大众型、社群型隐语则持续活跃,其中有一部分溢出进入了社会

流行语行列。

三、网络隐语的语言学生成逻辑

千百年来,思想家就语言的本质、人与语言的关系多有宏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等人都指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14]。非语言动物,比如猩猩,为了获取食物,可以被训练对一个符号做出正确反应,但它绝不可能“理解”该符号的正确性,哲学家、社群主义阵营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这种动物反应为外在的、机械的任务正确性(task rightness),只有具备智慧的人类可以创造语言,并以反思的积极能力使其语言具有描述正确性(descriptive rightness),即对事物“视其为本身所是”,从而达到一种内在正确性(intrinsic rightness)^[15]。这个内在正确性就是语言自身生成最重要的内部逻辑,它使得人类语言具有了构成性和整体意识。

表面上,很多网络隐语违背正常语言的生成逻辑,但人类语言的正确性要求语言不仅要达成清晰、准确表达事物这一描述的正确性,还要达成演绎的、写照的内在正确。人们通常掌握自己母语的语法知识,知道如何遣词造句,很多网民似乎有更多的语言天赋,其语言生产有更高的智慧。比如初代行话“---<<@”,发明者用电脑键盘符号组合模拟出一枝花朵的形状,看上去机械,但也只有人、只有网民能这样巧妙达成描述正确性的要求。而且网络隐言并不止于此,它往往自发地直指语言内在正确性的目标,达成演绎和写照的正确。比如“海龟”(指海外归国人员,谐音“海归”)“海带”(指海外归国且待业人员,谐音“海待”),尽管沿用现有词汇,但其转换生成文法的方式极其俏皮奇特,以一种隐喻准确生动描绘了人们对这两类群体的独特印象或想象。可见网络隐语发展了传统隐语曲笔言事的传统:一方面,其能指完全可以符合标准语言规则,但所指却很曲折隐蔽,在此语言真正成为“活的语言”。比如“我妈是我妈”,用来吐槽地方政府在许可审批服务中要求提交不必要证明材料而给老百姓徒增麻烦的荒诞现象。这显然是一种演绎的逻辑推理方式,但更是语言的写照正确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网络隐语也经常打破词形、词义、语法和修辞等语言规则,使其成为只属于网民的语言。其中,词形上的打破主要是体现在初代行话和后来的二次元用语、“火星文”上,词义、语法和修辞上的打破主要体现在大众型隐语上,其在演绎、写照事物的正确性方面更显智慧。比如“土鳖”,是社会崇尚海归派的年代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的自嘲。在此,“土鳖”的语言正确性就是一种说话者对自己感受的“正确诉说”,它是透过说话者在某种情境下对合适的词或表达的直觉感觉而具有的内在正确性,与作为外部条件的“土鳖”没有必然或唯一的关系。可见网络隐语在生成的那一刻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创造过程,它凸显创造者的独特认识和语言感知力,用一种他们直感的正确方式但偏离语言规则来描绘万事万物,使它们以一种崭新的、另类甚至离奇的方式直击网民、触动其心智,并帮助他们掌握了意义世界。

四、网络隐语现象生成的现实逻辑

马克思指出,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和思想的直接现实,人类“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6]。反过来说,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还具有整体意识,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实践发展是同构的。隐语现象亦如此,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生成逻辑,即语言与社会共变。各行各业、各社会集团出于其所处不同时代、生存环境、自身文化和交际需要,必然都会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特色语言。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语言不是形而上学的对象或实体,方言现象最能反映语言生成的现实逻辑,人们的居住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地域和文化背景正是语言的根基,即“大地”,语言在此开创世界,“它在自身涵养着向神、向世界、向人及人的创造、向物的关指”^[17]。形象地说,语言是“口之花朵”,“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现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

基的稳靠性”^[18]。这种对人类语言生发的诗意阐述与土生土长、言外之物、天地人神和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观念不谋而合,揭示了语言实践的社会性、实在性及其文化、哲学的意涵。

网络隐语生发和兴盛的“大地”“天空”就是从 Web1.0 时代的虚拟空间到 Web2.0 以来构建的网络社会。这个神奇的“网络地带”广泛、实在而严密地联结线上线下,裹挟不同时期各社会阶层、群体的特殊境遇、生活、故事和命运,浸染着他们的认识、精神和信仰,并将其渗透于他们的语言当中,他们以自己的语词来标记这一切事物,使其显现于其所存在、成其本质之中。具体来说:初代“行话”、颜文字之乍起,正是语言受虚拟空间驱动在此土生土长的结果。这个空间要求网民必须以键盘为口,先在语言能指上开出温情的花朵,才能弥补陌生虚拟交往中肉身脱域的缺憾,构建数字化的存在之家。二次元用语之流行,是中国“90后”“Z世代”的兴起及其对现实的反映。他们思想开放,对ACG文化和虚拟现实有天然的亲近感,又试图逃避现实压力,于是以外人难懂的群体语言构筑一种既投射现实又想象和绵延于虚拟世界的架空世界,从中获得身份认同^[19]。喧嚣五年中,热点事件流行语盛行有着更为真切现实动因。其间,我国社会、经济进入深度转型期,政治改革持续推进,因此现实各领域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为热点事件,其流行语反映了网民解构、娱乐一切的集体风格,而其之所以隐语化,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逃避政府对网络内容监管的需要。而2013年以来各类隐语的滥觞,背后亦有这十余年间社会诸现实矛盾、青年亚文化等持续变化的影子一一反映在公共语言生活当中。人类语言的本质就是为万事万物做标记或命名,网络隐语亦然,它像所有语言一样具有某种地位和权能,它是网民的话语权力,显现他们的认知、情感和精神内涵,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世界。如此,本质上不是网民主宰了自己的语言,这并非一种功利性、程序性和计算性操作的结果,恰恰相反,是网民受到自己栖身于此的、生生不息涌动又难以完全言说的“网络地带”这个源头的“滋养”,其语言在此大地性涌动、地带性发生和成长。

五、网络隐语实践的问题辨析

(一) 平衡语言创新与保护的关系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边缘语言现实一直受到争议,批评者认为其并非正常的语言,原因主要是其在构造法、语义转换方式上破坏了标准语言或母语的规则,导致语言失真、意义不明。黄安靖认为,母语系统有三个层级,核心是规范层,由纯粹规范的母语成分构成,之外是污染层,混杂有不规范成分,最外围的边沿层完全脱离母语规范,而只有规范层最符合母语的特征和社会文明道德规范^[20]。的确,有些类型的网络隐语变造了母语使用规则,甚至损害了人类语言最稳定的内核部分,看上去像是反语言、反传播。比如二次元用语,多使用符号表音、生僻字和异体字、随意拆字、生造词汇、繁简和中外字词混用等方式,对标准语言进行极其简单粗暴的破坏性操作;再如“火星文”,发明者采用各种图符,将自己思维中的意义转化为一种纯粹形式化的符号和结构,造成语言能指过重、过度而所指过轻、不清。为了保护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应该弃用那些破坏语言核心规则的语言,但同时要承认,语言活在变化中,网络语言是网民智慧创造的、可以言说且相互理解因而事实上有效的交际语言,其发音、鸣响、震颤、飘荡都具有语言学意义,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语言文化的宝库。正因如此,一些网络流行语、隐语受到大众的欢迎和使用,大多数则因为最终无人使用而消失了。实际上,网络语言至今没有独立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几乎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语言,对其对语言的破坏性不必过于担忧,对其创造性应该肯定。

(二) 语用主体自由边界在于现实正当性

网络隐语作为社会语言的客观现象,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实践受语言与社会共变规律的制约,也反映了不同语用主体的集体期望和自由选择,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人们对这类网络语言现象也多持宽容态度。但是,语用主体的语言创造和自由选择权利是否应有一定的边界?比如“帝吧出征”现象,吧友们创造了很多批判“港独”“台独”的隐语,其爱国情怀值得肯定,但其“爆

吧”的语言暴力也引起争议。如果说人类语言中同时蕴含创造性和暴力倾向,那么必须关注语言的民主、社会平等权利争夺即其现实正当性问题。多年来,在网络流行语所汇聚的大众心理的连续光谱中,“一端是理性、智慧与公意,另一端则是粗鄙、狂野和暴戾”^[21]。这种暴力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暴力的语言,随意变造语言,盗猎、挪用和改造他人文本;二是语言的暴力,对周遭一切不合意对象加以无情的污辱、嘲讽、解构或报复,这种语言暴力甚至还被崇高化。实际上表明网民的语言自由存在片面性,即只在乎满足语言游戏的狂欢而丧失“能而不为”的自由,这种语言交往也就失去对现实的建设性效用。所以说,主体的自由乃至其语言本身的“内在正确性”都不表明其言语实践就自然拥有现实正当性。为此,我们要剔除误解和偏见,保持清醒认识和合理态度,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种阶段性出现、必然性表达的社会语言现象,既不必因其非正式、非主流而迫其就范或将其没收,也不能就此放任,而要在其语言的游戏与破坏、内容的正当与不当、目的的批评与颠覆之间做出判断,宽容其无害的部分,运用其有益的部分,规范引导其低俗、落后的部分。同时,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对那些消解、破坏和对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应坚决打击,以促进网络语言的健康发展,提升其对母语文化和公共利益的建设性作用。

(三)走出“孤岛”重建文化交往“巴别塔”

互联网诞生后,人们想象新技术将为人类构筑一个电子乌托邦,但很快发现先在的第一现实无疑更具优越性。Web2.0以来,强大的互联网既在物理上联结了所有人、社群、组织和文化,同时又在信息认知、文化思想层面上制造出一个个鸡犬不相闻的“孤岛”,社会原有偏见、歧视、仇恨等现象有了新的网络版本。语言上,这种“孤岛”就是网民这个母语社团在共时性、历时性上都涌现出不同的次言语社团,他们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在各自所属电子部落内操着自己的语言,使用“你懂的”这个一切网络隐语的代名词,构建出一个个他性实有、内部自由和集体认同的异托邦,从而可能对公共参与、公共精神形成侵蚀^[22]。正如现在年纪稍大的网民抱怨“不用‘网络梗’都不会说话了”,不仅大众型隐语面对官方话语体系划出了一条语言鸿沟,青少年网民内部的不同亚文化之间也各有私语密谈,在同代际间造成了思想沟壑。这些都给本来阡陌交通的互联网公共交往带来了巨大障碍。与其说,网络隐语是活的语言,不如说是语言的“化石”,被用来高筑壁垒,封闭、阻隔和排斥圈外的交流。古巴比伦人的巴别塔神话早已启示,沟通是人类语言与社会关系建设的核心价值。网络时代我们如何走出群际语言变乱与文化隔阂的困境,重建思想文化交往的巴别塔?语言是我们共同的存在之家,所有言语社团应秉持言语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意识,在语言的自由创造、使用与母语文化的保护发展之间、在语言消费者和文化公民(citizen culture)角色之间寻求平衡。尤其是青年网民,在追求社区感、群体理想、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批评中应避免纯粹语言的狂欢,不坠入思想的回音室与价值虚无的陷阱。为此,我们应共同致力建设新的“网络地带”,在数字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条四面八方的人容易进入又有规矩的“人行道”^[23],让人人可以在此相遇、攀谈和倾听,让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在此对话、沟通和理解,共筑网络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致和美好。

参考文献:

- [1] 郑丹娘.“网络流行语”与青少年“自说自话”. 中国青年研究,2001,4:21-23.
- [2] 王英.网络流行语现象解析.新闻前哨,2009,8:87.
- [3] 黄碧云.新生代网络流行语的符号学解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2:108
- [4] 曲彦斌.网络民俗语言探析.人民日报,2000-06-20(011).
- [5] 闫婷婷.网络隐语的传播特征.新闻世界,2010,S2:154.
- [6] 曲彦斌.现实社会生活视野下的隐语行话.江西社会科学,2009,11:230-235.
- [7] 宋兴晟,冯志英.网络用语和隐语产生背景之比较.职业教育研究,2008,9:138.
- [8] 冯晓瑾,张黎.“互联网+”背景下的涉毒隐语发展趋势与识别路径.政法学刊,2021,3:107.
- [9] 王仕勇.近十年我国网络流行语研究综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1.

- [10] 陈原. 社会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2004: 212.
- [11] 张路. 从“符号”到“世界”: 二次元文化的审美路径. 学习与探索, 2019, 10: 183-189.
- [12] 刘美林.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分析隐语. 时代文学, 2008, 4: 37-39.
- [13] 王聪聪, 田栋栋. 2008: 中国政府身段最灵活的一年. 中国青年报, 2008-12-30(A7).
- [14]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
- [15] 杨桦. 论查尔斯·泰勒语言哲学中的“正确性”概念. 哲学动态, 2021, 3: 88-95.
- [16]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2.
- [17] 海德格尔. 思的经验. 陈春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03; 109.
- [18] 谭容培, 牟方磊. 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真义.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6: 12.
- [19] 李耘耕. 二次元异托邦: B站“拜年祭”融合文化实践研究. 新闻记者, 2022, 2: 85.
- [20] 施晨露. 拿捏了!《咬文嚼字》发布 2022 十大流行语, 这些大热词为何落选. 上观新闻, 2022-12-26. [2024-03-06]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65498.html>.
- [21] 李明洁. 流行语: 民间表述与社会记忆. 探索与争鸣, 2013, 12: 83-85.
- [22] 张运洪. 试析“信息茧房”对公共精神的危害. 北方传媒研究, 2023, 4: 83.
- [23]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黄维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45.

The Variation, Internal Logic and Problems of Network Insinuating Language

Zheng Zhibin (Nanc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Internet cryptic language has its origins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nd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rise of primitive jargon, the outbreak of cryptic language in sub-cultural groups, the crypticization of buzzwords in hot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cryptic language in the general public and communities. Internet cryptography, as a form of “linguistic folklore” in the digital era, represent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urvival practices of netizens as speech subjects. This phenomenon is underpinned by two distinct logics: it adheres 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language generation, known as “intrinsic correctness”, while also embodying a profound “network locality” that reflects its contextual reality in the online sphere. Through their languages, these various linguistic communities not only directly face and deconstruct the external world, but also construct a “home of existenc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world. Internet cryptic language has its own closedness, backwardness and challenge to mainstream culture. Internet users should control their freedom of language an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verbal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society shoul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to meet on the Internet, promote their emergence from inter-group isolation, and work together to unify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on the Internet.

Key words: internet buzzwords; cryptic language; internal logic; speech community

■ 收稿日期: 2024-10-22

■ 作者单位: 郑智斌,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 责任编辑: 刘金波